

贵州钱币

2018年第2期
(总第22期)

主 管：中国人民银行
贵阳中心支行
主 办：贵州省钱币学会
编辑出版：《贵州钱币》
编辑部
主 编：肖 杰
副 主 编：秦少华

责任编辑：张传新 刘 华
黄雅迪

校 对：刘 华 黄雅迪
地 址：贵阳市富源中路
318号人民银行
贵阳中心支行2楼

邮 编：550005
电 话：0851-83921722
Email: liu3921722@qq.com

刊头题字：黄锡全
2018年12月出版

贵州钱币

- 贵州省博物馆馆藏钱币·····袁 炜 2
浅谈谷正伦贵州执政时期铸造银铜币概况·····余建革 9

纪念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

- 遵义解放初期的货币斗争·····譙胜元 12

钱币研究

- 近代钞票上的银元初探（下）·····叶真铭 15
浅析第四套人民币价值·····黄文晖 罗 敏 黄 竹 25
光绪宝库局小平铸币新猜想·····黄雅迪 33

钱币随笔

- 从人民币发行看新中国的繁荣昌盛·····宋康年 40
从一枚钱币，了解一段历史·····费 勇 42

目录



贵州省博物馆馆藏钱币

■ 袁 炜

一、总述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早在西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在今贵州地域设立郡县之时，随着中原移民的到来，贵州地域开始行用五铢钱，此后唐宋钱币相继流入贵州地域。[杨菊：《贵州出土宋代钱币浅析》，《贵州文史丛刊》2018年第3期，第72~75页。]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正式设立布政使司。由此，贵州作为省一级的行政建制正式成立。明弘治十二年（1503年），贵州设置钱局铸造弘治通宝，贵州开启铸币历史，[胡致祥、钱存浩：《贵州古代货币与货币流通》，贵州省钱币学会、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贵州钱币资料（第二辑）》，内部发行，1986年，第58~66页。]此后清、民国两代，因袭不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币成为唯一法定货币，贵州历史货币退出流通领域。1958年，随着贵州省博物馆正式开馆，作为具有重要历史、经济、文化价值的贵州历史货币成为贵州省博物馆藏品门类中具有极高价值的一类，经过六十年的积累，迄今为止，贵州省博

物馆共收藏有各类历史货币7000余枚，以及不少于钱币密切相关的珍贵历史文物。

二、类别

依据不同的划分方式和划分标准，贵州省博物馆馆藏钱币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按征集方式来划分，可分为科学考古出土钱币和非科学考古出土钱币；按钱币时代来划分，可分为先秦钱币、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传统钱币，近代机制币、人民币等；按钱币铸行地域划分，可分为贵州本土铸币、中国钱币、外国钱币等；按钱币材质划分，可分为贵金属币、贱金属币、纸钞等。

三、特征

贵州省博物馆馆藏钱币品种多样，很难用某一类特征涵盖所有所藏钱币。但有两类对贵州历史、经济、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的钱币，可以分别总结其特征。这两类钱币一是贵州地域科学考古出土钱币，其时代自西汉武帝直至近代，其特征

是，深受巴蜀、两湖同时期钱币文化的影响，在汉代流行五铢钱，三国时期使用蜀汉钱，唐代通行开元通宝钱，宋代行用包括铜钱、铁钱和银锭在内的宋代金属货币，明清通行铜钱、银锭等。另一类钱币是馆藏贵州地域铸造的钱币，此类钱币中，时代最早的是永历通宝背一分钱，永历通宝背五厘钱，据学者根据清康熙《遵义府志》及清康熙《遵义府志》转引《棠阴扎记》关于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公元1651年）南明孙可望部将在遵义开场设局，铸行钱币的记载，认为此版别永历通宝乃铸造于贵州遵义。[钱存浩：《“永历通宝”初探——遵义曾设“永历钱局”铸永历折银钱》，贵州省钱币学会、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贵州钱币资料（第二辑）》，内部发行，1986年，第48~51页。]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清政府在贵州毕节设立宝黔局并铸行钱币，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毕节局裁撤并于次年移设宝黔局于贵阳，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分宝黔局五炉于大定（今大方县）局铸钱，光绪初年废宝黔局。可见，从清雍正到光绪，除同治外，宝黔局均铸行有制钱。[陈衍润：《清代贵州铸钱史话》，贵州省钱币学会、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贵州钱币资料（第二辑）》，内部发行，1986年，第69~72

页。]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贵州官钱局成立，在省会贵阳发行公估平壹两的银两票。以往有人认为所谓的“黔宝”银饼即为贵州官钱局所铸，但我馆并未有收藏，笔者就此问题与浙江省博物馆相关金银币专家交流后，一致认为“黔宝”银饼当为民国时期的臆造品。民国时期，1912年，贵州银行发行“贵州银行兑换券”，简称“黔币”，俗称“花票”；1915年，中国银行贵州分行在贵阳开业，发行加盖“贵州”两个红字的“中国银行兑换券”；1924年，贵州军阀周西成在赤水县仿“孙头”和仿“四川汉版”银元打钻有“周”字标志的“赤造银元”；1928年，为纪念贵州修建公路，铸行“汽车银元”约五万枚，这也是世界上第一种有汽车图案的钱币；1931年，贵州铸造当十铜币，以金属铜为货币材质，这不仅在国内是创举，在世界钱币史上也属罕见；1949年，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在贵州垮台的时候，贵州铸行“竹枝银元”、“黔”字廿分银辅币及纸币银元辅币券，这是贵州发行的最后一种钱币。[钱存浩：《贵州钱币发展史概述》，贵州省钱币学会、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贵州钱币资料（第二辑）》，内部发行，1986年，第30~40页。]除此之外，晚清民国时期，贵州商民等也发行有种类繁多

• 4 •

Two circular coins with a square hole in the center, showing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oins are dark and appear to be made of metal. The characters are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贵州银行纸币

贵州银行纸币，该币是唐继尧任贵州都督时于1912年至1924年间发行的，先后印行三次，共发行420万元。纸质，有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两角、一角6种面值，均为横长式。这种纸币因系贵州地方政府发行，故俗称“黔币”。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有其中五

种不同面值的黔币。十元券长17.5厘米，宽11.7厘米，票面用绿、褐、紫三色套色印刷，纸币正面有篆体朱文“贵州财政司长之章”，“贵州黔丰银行行长印”二印；背面有“贵州省长之章”朱文印；五元券长16.6厘米，宽10.6厘米，用黑、蓝、绿三色套色印刷，纸币正背面的朱文印与十元券相同；一元券长16厘米，宽9.4厘米，用黑、绿、黄三色套色印刷，纸币正面右铃“贵州财政司长之章”，左铃“贵州银行总理之章”，背面朱印与十元券相同。两角券长8.2厘米，宽2.1厘米，绿色单色印刷，纸币正面铃印与一元券相同，背面铃“贵州民政司长章”；一角券长7.4厘米，宽1.4厘米，绿色单色印刷，纸币正面铃印与一元券相同，背面铃“贵州都督之章”。此币发行量大且无保证金，故在发行后不久即出现贬值。[简小艳：《民国贵州银行拾元纸币》，李黔滨主编：《贵州省博物馆藏品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贵州“当十镍币”，圆形，直径2厘米，厚0.15厘米，重5克。钱币正面正中铸“当十镍币”，对读，上端铸“中华民国二十年”，下端铸“贵州省造”，背面正中铸国民党党徽，党徽上下各有一小五角星图案。此币是王家烈主持贵州省政期间，利用贵州产镍、铅为原

料铸造的流通辅币。其合金成分比例，据当代钱币学者根据静水力学法分析和锑铅含量大约为4：6；XRF 荧光光谱仪实测一枚“当十锑币”，其主要合金成分为锑 45.9%，铅 52.44%，铜 0.29%，钛 0.85%。[张海龙：《锑币考叙》，《中国钱币》2018年第5期，第29页。]此币由“贵阳修枪厂（原贵州造币厂，厂址在贵阳大南门外原华家造纸厂）”打制，铸行50万枚，经政府公告，指定贵州银行于1933年在贵阳发行。当时规定兑换价格为一元大洋兑换四百枚锑币，即一枚锑币值银元二厘五毫。该币材质独特，除此币外，仅有日本在1944年、1945年发行过锑锌合金流通币。[贵州钱币学界以往一直认为除贵州“当十锑币”外，仅有联邦德国发行过以金属锑为材料的钱币，此说谬矣。见钱存浩：《贵州的几种历史货币》，贵州省钱币学会、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贵州钱币资料（第二辑）》，内部发行，1986年，第96页；Chester L. Krause, 2010 Standard catalog of world coins 1901-2000, Krause Publications, 2010, pp1270-1272, 1279.]



当十铤币正背面



汽车银币正背面

贵州汽车银币。1928年，贵阳至桐梓的省道竣工通车，贵州省长周西成特命贵州造币厂铸行贵州汽车银币以示纪念。此币直径3.9厘米，重26.2克，齿边，成色在78%~79%之间，发行量50000枚。正面正中为“贵州银币”四字，对读，四字中间为芙蓉花图案，四字外有一圈连珠纹，连珠纹上部为“中国民国十七年”，连珠纹左右各有一四瓣梅花纹，连珠纹下部为“壹元”二字；背面中间为在草地上行驶的汽车图案，上部为“贵州省政府造”，下边为“七钱二分”字样。草地由28片草叶构成，寓意此币是1928年铸造发行，汽车前轮有12根辐条，寓意一年12个月平安吉祥、如意发达。此币草地图案中隐藏着由草叶构成的“西成”二字暗记作为防伪标识。钱币上汽车图案的原型是周西成从香港购来的美国福特牌敞篷汽车，这也是贵州第一辆汽车。[全锐：《民国贵州汽车纹壹圆银币》，李黔滨主编：《贵州省博物馆藏品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贵州竹枝银元。1949年下半

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在贵州的统治即将垮台，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鉴于金圆券、银圆券急遽贬值，故另立金融体系，令贵州造币厂铸行竹枝银元。此币直径3.8厘米，重26.65克，成色为88%，面值一元。正面正中为贵阳市著名风景名胜“甲秀楼”图案，“甲秀楼”图案外为一圈纹饰，纹饰上部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纹饰左右侧靠下部各有一五瓣梅花纹，下部为“贵州省造”；背面正中为三株金竹图案，外圈饰连珠纹，左右两边铸“壹圆”二字。据史料记载，竹枝银元铸造时间短，日产量低，估计铸造总额不超过10000枚，主要在贵阳市及滇黔公路沿线城镇流通，流通时间不到一个月。[刘明琼：《民国贵州竹枝银元》，李黔滨主编：《贵州省博物馆藏品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竹枝银元正背面

贵州当半分铜元。1949年下半年铸行，黄铜材质，圆形，直径3.6厘米，重18.7克。正面正中楷书“铜元”二字，直读，外为连珠纹。上部有“贵州省造”四字，下

部有面值“当银元半分”；背面正中为楷书“黔”字，外为连珠纹，上部有铸造年份“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下部为嘉禾图案，铸造数量约100万枚。此币系竹枝银元的辅币，故面值单位采用“当银元半分”，即一枚竹枝银元法定兑换200枚当半分铜元。[刘明琼：《民国贵州当半分铜元》，李黔滨主编：《贵州省博物馆藏品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6页。]



当半分铜元正背面

五、价值与意义

贵州省博物馆藏钱币的价值和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从历史学角度，贵州省博物馆藏钱币是研究贵州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的重要证据，对构建贵州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从经济学角度，贵州省博物馆藏钱币是过去两千年来贵州货币发展的实物遗存，为贵州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佐证；从艺术角度，贵州省博物馆藏钱币浓缩了自汉代至今，中国乃至世界其它国家钱币艺术造型的精华，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作者：贵州省博物馆助理馆员

浅谈谷正伦贵州执政时期铸造银铜币概况

余建革



活跃在民国政坛上的贵州安顺“谷氏三兄弟”——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声名显，有“一门三中委、兄弟皆部长”之称，与宋氏三姐妹齐名，谷氏三兄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时人称“一门三中委”。抗日战争后期，谷正伦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纲任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鼎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当时权势之盛，名显一时。

谷家原住安顺旧州，谷氏三兄弟的祖父以买卖烟土起家，后迁居安顺县城原“铜匠街”（今日叫前进路）。他们的父亲谷兰皋是个武秀才，继承了他们祖父的旧业继续经营烟土生意，因特别精于盘算，

购置了不少田地，成了当时安顺远近闻名的大地主。

谷氏三兄弟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早在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五大”会议上，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谷氏一门三中委”成为当时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三兄弟同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谷氏三兄弟既非蒋介石的“门生”、“故吏”，也不是蒋介石的同乡、好友。但是，他们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谷正伦不仅担任南京宪兵司令长达十年之久，而且还曾先后任过甘肃省和贵州省主席，做过蒋家王朝的“封疆大吏”。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蒋家王朝随之崩溃，然而蒋介石并未甘心彻底失败，于逃遁台湾之前委任谷正伦为贵州省政府主席，企图占据西南一隅，与我解放大军抗衡，希望恢复其独裁统治。谷正伦到任后，除着手军事上的部署之外，在经济上亦采取相应措施，其时，贵州地方金融已全面狂泻，金融市场紊乱，已濒临全面崩溃的阶段。谷正伦为稳定地方经济危机和军队给养，同时也为自己另立金融体系，一方面大开鸦片烟禁，征收“特税”，向商民收取“反共自卫特捐”巧取豪夺，开辟财源；另一方面指使省参议会通过决议指定贵州银行发行一元纸币及五角、二角、一角辅币，并指示省财政厅厅长潘锡元，赶速筹组贵州省造币厂，铸造一元银元及银辅币，希图稳定地方金融、财政危机，据守西南山区作最后挣扎，挽救即将灭亡的命运。于一九四九年七至十月份开始铸造发行竹子银元、半分铜元、廿分银辅币各一枚。

竹枝银元简介：此币正面内芯为贵阳市著名风景名胜甲秀楼图案，外圈上边缘铸“中华民国卅八年”，下边缘铸“贵州省造”字样，均为楷书；背面为金竹三株的图案。左、右两边铸大写楷书“壹圆”二字；每枚该币重26.20克，直径为3.85厘米，含纯银88%。其规格、

重量、成色均符合当时银元标准。故老百姓称为“竹子钱”。综合上述情况分析，筹组贵州省造币厂同时，委任原任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谢傑民为厂长，于民国卅八年（1949年）7月开始筹备，所用机器设备，除沿用周西成时代造币厂遗留的部分机器外，小部分从广州购置，于10月中旬在黔元造纸厂开始试铸造。于1949年10月铸造了一批“竹枝银元”。据有关资料统计，竹子银元在铸造大概在一万枚左右。

通观此币，颇耐人寻味，甲秀楼、当属贵阳之象征。竹枝、贵阳曾以金竹为市徽。仔细观察，币面甲秀楼图案亭子底部、隐刻着一针头大小“谷”字，楼底基础石三块由“TLK”组成，此币谷氏之英文缩写；竹枝图案，三根大则直节向上。另一根细小弯曲。据说三竹隐喻谷氏昆仲三人，细弯之竹则为闲居家中四弟。谷正伦妄图通过整肃金融、军事并举，盘踞贵州挽救国民党的灭亡命运。然而，此币铸造不到一个月，贵州即告解放，谷氏之梦想随之破灭，竹子银元，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见证留存于世。

贵州半分铜元：它是旧中国货币历史上最后发行的一枚铜元，则由贵州物产公司总经理朱迈沧在广州购置铸造半分铜元及廿分银辅币钢模和铸造机，并聘请技师，由贵州

青山矿业药品工厂铸造，此币于民国卅八年七月七日发行，数量为100万枚，比值为200枚兑换银元一枚。当半分铜元投放市场不久，即因铜价高昂，且已超过了规定的币面价值，立即采取停铸，并回炉熔化，最终未能起到调剂市场的作用。此币正面内芯铸有楷书“铜元”二字、直读，外圈上边缘铸“贵州省造”，下边缘铸“当银元半分”字样；背面内芯为篆体“黔”字，外圈上边缘铸“中华民国卅八年”，下边缘铸禾稻图样。此币直径约3.6—3.7厘米、重量为16.72克左右。半分铜元设计独自一格，体现了它直接与银元挂钩，改变清末民国时期币值单位（“文”改“分”），在设计方面大胆创新，特别在背面中心的篆书“黔”上，突出了地方风格，代表贵州独特一面。

“黔”字廿分银辅币：正面内芯铸“廿分银币”四字，上边缘铸“中华民国卅八年”，下边缘铸“贵州省造”字样，背面铸“黔”字并以“20”排列作内圈周围，重量为5.2克，含银量为88%，直径为23.6

毫米,每五枚兑换银元一元,从相关资料来看,此币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财政金融已濒临全面崩溃阶段,加上人民解放大军临近贵州省境界,为保军费之用,当时主要尽量铸造一元银币。因此“黔”字廿分银辅币按计划少数试铸,在市场试用。

贵州省会是1949年11月15日解放的，上述“竹枝银元”、“半分铜元”都是1949年7月至10月期间铸造发行，在贵州境内流通了一个较短的时期，这不仅成为贵州钱币历史上最后铸造流通的两枚金属货币，也是迄今为止在祖国大陆最后铸造、最后流通的银元和铜元。这两枚货币竟成为国民党政权图谋据守西南山区，抵抗解放大西南铁的见证。而这种具有贵州独特风格的钱币流传至今为数不多。早已是币中珍，随着时间推移，此币多被持有者收藏及兑换给政府有关部门销毁。笔者走访和询问安顺老年人了解到，安顺位于贵州省中西部，素有“黔之腹、滇之喉、蜀粤之唇齿”之称，是黔中地区商品集散地。特别是贵州临解放前夕，纸币贬值，物价上涨，部分国民党政府官

员、大小商人到安顺抢购物资，全部使用黄金、银元交易，加上国民党溃军大部分人员往云南方向逃窜，竹枝银元又用于军人“资遣费”和“应变费”等费用。据相关资料显示，竹枝银元大部分流通于贵阳、安顺、六盘水等地。直到文化大革命初中期，有不少解放前的地主及商人为了躲避政治风波，把大量贵州时期铸造的钱币、瓷器等

古董丢掉在安顺虹山水库中，使谷正伦执政时期的银元与铜元其存量日益稀少。总而言之，迄今为止，这三枚充分体现了设计者的智慧和创新，已成为当代国际钱币市场上稀有的历史货币珍品。

作者：人民银行安顺中心支行
干部 中国钱币学会会员 贵州省钱币学会理事

遵义解放初期的货币斗争

■ 譙胜元

一、整顿金融市场

遵义解放前夕，市场商品严重匮乏，物价飞涨，货币流通混乱，黄金、白银、外币充斥市场，金融投机猖獗。

1949年11月21日，遵义解放，24日，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中国、农民、交通、贵州银行遵义办事处，组建人民银行遵义支行。

1949年11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办事处发出通告：由政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本位币，任何地区、任何单位无权发行任何货币、变相货币、货币代用品，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严禁伪造、变造和破坏。即日起，其他各种货币一律停止流通。同时规定“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的支付、物价、债务、帐务、票据、契约等，均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违者以扰乱金融惩办。同年年底，根据省分行文件，为了减少群众因政治变革带来的货币损失，照顾群众生活，扩大人民币市场，稳定物

价，促进流通，12月，人行遵义支行挂牌收兑黄金、银元、银元券，兑换比例为人民币100元(旧币)兑银元券1元，人民币6000元收兑银元1元，人民币14万元收兑黄金1两(旧制16两秤)，此举深得群众拥护。与此同时，遵义专员公署、军管会、人民银行遵义支行联合组成禁银委员会，广泛向群众宣传人民币为唯一法定货币，金、银只能到人民银行兑换，不准在市场流通，严厉打击扰乱金融的犯罪活动。各县市相继召开“禁银大会”，散发“拥护人民币，禁用银元，反对金银投机，稳定物价”的传单，大造声势，使人民币深入人心。截至1950年底，人民银行遵义支行共收兑黄金1038两，饰金居多，条金较少，收兑银元共计11072枚。银行配合禁银活动，积极开展保本保值储蓄和折实储蓄，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银行对金银收兑价格曾几次适当调高，并组织稽察队，对市场贩卖金银者进行严厉打击，逮捕银元贩子3人，收缴银元937元，至1951年1月，银圆、黄金黑市交易消失。

此外，银行还组织流动服务组，深入街道、集镇、农村，开展存款、贷款、汇兑业务。并实行货币管理，组织现金回笼，县城物价逐渐平稳，经济秩序恢复正常，人民币基本占领市场，并从城市迅速

流向农村。

二、平息匪患

1950年2月至3月，遵义地区各地土匪活动猖獗。

4月3日，国民党起义部队328师982团大部在余庆叛乱；4月7日，蔡世康983团在余庆龙溪全团叛乱，遵义地区叛匪及土匪增至12000多人。

根据省委、省军区决定和地委、专署、军分区的通知，4月2日，道真县人民政府撤到绥阳县；4月6日，正安县人民政府撤到绥阳县旺草区；4月8日，余庆县人民政府撤到黄平县旧州；4月12日，务川县人民政府撤到风冈县绥阳场；4月27日，中共习水县委、县人民政府奉命撤离县城官渡，到赤水县休整，5月16日迁驻习水县温水镇，后迁东皇。

土匪暴乱，交通堵塞，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市场物价飞涨，金银黑市猖獗，“盐荒”严重，盐价比平时高出五六倍，湄潭县1块大洋只能买4两盐巴。

针对严峻形势，3月中旬，地委决定建立遵义专区剿匪委员会，由地委书记陈璞如任主任，十六军参谋长杨俊生任副主任，十六军从成都(战役)回遵义后，地委根据敌情，重新部署，有重点地集中兵力，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几次大规模的剿匪合围。通过官店合围，

瓮安、余庆、湄潭合围，金沙合围，仁怀北部合围和黔东北大合围，共剿灭土匪武装114余股，歼匪3.3万余人，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巨大胜利。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群众安心从事生产，市场物价开始回落。

三、抑制物价

由于受全国物价上涨的影响，加上遵义群众深受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之苦，一时又对人民币认识不足，有部分群众只愿接受银元而不愿意接受人民币，曾经有100多名小贩持人民币集结于银行门前，要求兑换银元，市场上出现抢购物资情况，外地不法商人也来遵义抢购、囤积物资，从12月13日开始，市场物价上涨，16、17日猛涨，个别商店为此还曾关门歇业，经济出现十分困难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地区各级党政军领导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除了大力宣传使用人民币，取缔银元黑市，消除了群众顾虑。适当提高物价，及时纠正了在处理经济问题的一些失误外。并召开各种紧急会议，把解决“盐荒”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遵义军分区党委，决定抽调部队进行武装押运，并拨出大批车辆，交地方贸易公司使用，要求“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作出何等牺牲，一定将盐、棉由重庆安全运回遵义。”地委又加派杨绍荣、

倪忠珍、丁世明3位老红军到遵义贸易分公司任经理，和大家一起，全力以赴，一面派出车队加紧武装运盐，一面组织力量增设贸易网点，将少量库存盐定量供应市民，以利过“盐荒”。

车队在七八个月的时间里，在土匪出没无常的川黔公路线上来回数十趟，运回三四千吨盐巴和棉纱等物资，没有出过一次差错，保证了遵义人民度过“盐荒”。同时，由于交通治安好转，工商业者从遵义买油类商品运往重庆、贵阳等地日益增多，网营公司收购粮食、猪鬃、桐油，货币出笼增多，市场渐现活跃，物价回落。

1951年，随着遵义效区农村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任务顺利完成，农村经济得以复苏，农民安居乐业。中国人民银行遵义支行针对这些有利条件，派出8个流动服务组分赴县属各区，开展农村金融工作，流动服务用信贷方式投放人民币。年底，全县农村已普遍使用人民币。《遵义县金融志》1952年，遵义地区城乡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币从城市到农村广泛流通，占领了城乡市场，成为合法货币，它有力地政权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锦屏县支行行长

近代钞票上的银元初探（下）

■ 叶真铭

4.近代钞票上出现的银元，银元数量（总面值）一般与钞票面额相同，表明钞票可以十足兑换相应面值的银币，以此昭示信用，便利流通。



天津万义川银号10元银元票

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天津万义川银号发行的天津通用银元票，有1元、2元、5元、10元四种面额，正面有面值文字及双龙戏珠图案，背面有“天津通行银元”及“万义川记”字样，背面中央有“北洋造·光绪二十九年·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背面图案，银元数量（总面值）均与钞票面额相等。如10元银元票，背面即有一摞10个银币图案，每个银币1

元，总面值共10元，与钞票面额相等，表明此10元银元票可以十足兑换10枚银币。

宣统年间北京广源银号发行的银元票，有10元、5元、1元三种面值，票背面中央都有“北洋造·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背面图案，银币数量分别为10枚、5枚和1枚，与钞票面额相等。



宣统年北京广源银号10元

民国十七年（1928年）福建省福安县穆洋永原钱庄发行的大洋票，有1角、2角、3角、5角、1元、2元六种面额，均由黄百成先

生创办的福建百城印务局印制，钞票纸幅大、面值多、色彩繁，图文漂亮，印制精美。票面皆竖式设计，正面中央框内有面额文字“凭票支大洋XX正”，下方皆有银币图案，银币数量（总面值）与钞票面额相等。如1元、2元券上的银币，银币中间有面值“壹圆”文字及双束嘉禾图案，四周环绕英文，为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背面图案。1元券上有1枚银币图案，2元券上有2枚银币图案，银币数量（总面值）与钞票面额相等；1角、2角、3角、5角券上的银币，银币中间有面值“壹角”、“每十枚当一圆”字样及交叉双旗图案，为民国十六年福建总理纪念币壹角银辅币背面图案，其中1角券上绘1枚银币图案，2角券上分列2枚银币图案，3角券上有3枚银币图案，5角券上叠放5枚银币图案，银币数量（总面值）均与钞票面额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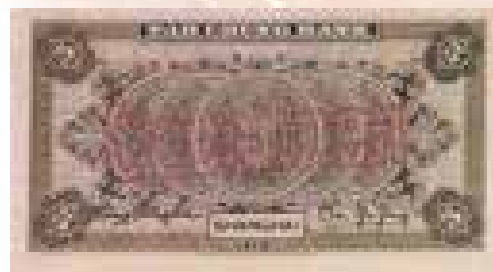
民国17年福安穆洋永原大洋票

民国年间福建省福安县穆洋协源钱庄发行的5元大洋票，正面有“凭票支银元伍圆正”文字，背面中央有民国三年版袁世凯像银币正面图案，数量共五枚，呈相互叠压状，银币总面值共五元，与钞票面额相同，银币与纸币完美结合，设计很形象。



民国福建福安县穆洋协源钱庄5元大洋票

1932年中大银行上海伍元券，背面单面印刷样票上有5枚袁世凯像银币图案，均为银币背面图案，枚数如面额。



大中银行1932年5元券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福建省寿宁县恒升有钱庄发行的3角面值钱庄票，票背面中央并列3枚银币图案，皆为总理纪念币壹角银辅币背面图案，银币面值“壹角”，3枚总面值三角，与钞票面额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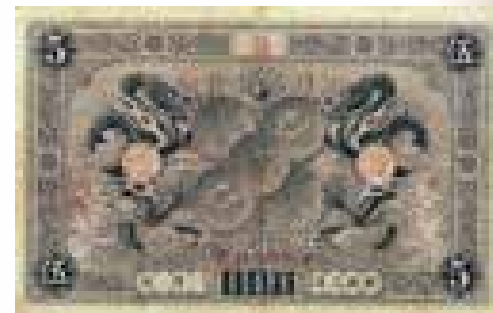


福建寿宁恒升有钱庄3角票正背面

5. 近代钞票上出现的银元，既有真实存在的实物银币，也有并无实物货币的仿币。

如前所述，出现于近代钞票上的银元，如湖北省造光绪龙洋银元、广东省造光绪龙洋银元、江南省造光绪龙洋银元、安徽省造光绪龙洋银元、北洋造光绪元宝银元、袁世凯像银币、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孙中山像船洋银币、民国福建省铸“福建官局造·壹毫银币”、福建省造总理纪念币1角型银币等，都是当时真实存在的、广泛参与市场流通使用的实物银币。但有些钞票上出现的银元，现实中

并无真正的实物货币存在，只是模仿实物货币形制的仿币。



宣统二年广西银行5元乌龙票

如清宣统二年广西银行乌龙票上的“广西省造·宣统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元，即是一枚模仿实物货币的仿币。宣统二年（1910年）3月，广西巡抚张鸣岐实施“新政”，将广西官银钱号改组为“广西银行”，成为当时全国四家省银行之一。在改组广西银行前的筹备期间，即向日本帝国政府印刷局定印了广西银行银元券，有1元和5元两种面额，其中1元面值印100万张，5元面值印20万张。1910年底，该纸币运回广西，当年底只发行了5656元，剩余的大部在第2年陆续发行。1年后，随着清王朝倒台，该币遂逐步废止。由于这两种银元券正面面额两侧各印有一条乌黑色的飞龙，所以人们称之为“乌龙票”。1元、5元乌龙票正面中央都印有一种“广西省造·宣统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元图案，其中1元券上有1枚银币正面图案，5元券上有5枚银币呈相互叠压状，3枚银币为正面图案，2枚银币背面

图案。票面上的“广西省造·宣统元宝”银元至今不曾见到实物，也未见诸史籍记载，此种银元根本没有实物货币存在，只是模仿真实流通货币描画的银元图案。两种面额的乌龙票皆存世稀少，非常罕见。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两种面值票总共仅见七枚，其中1元券三枚、5元券四枚。上海泓盛2014年春季拍卖会中国纸币专场曾上拍一枚1元乌龙票，加盖“桂”（林）地名，略有修补，估价为30万元，成交价56万元。2010年中国嘉德上拍一枚5元乌龙票，拍出123万元人民币。

江南裕宁官银钱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端方肖像银元钞票，有1元、5元、10元三种面值，票背面中间为端方半身肖像，人物像两侧各有1枚“江南省造·通用大银元”图案，银币正面在左，背面在右。据查，“江南省造·通用大银元”也是并无实物货币的仿币。



江南裕宁官银钱局光绪33年龙洋票
华商上海信成银行光绪三十四

年（1908年）版银元票横式1元券和5元券，正面面值两侧各有1枚龙洋银币图案，左为银币正面图案，上有“通用银圆·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等文字；右为银币背面图案，上有蟠龙图案及英文字母。此种龙洋银币并无真实货币存在，只是模仿真实流通货币描画的银元图案。



信成银行光绪34年版银元票5元

辛亥革命后，1912年四川银行因周转不灵停闭，四川军政府恢复营业 濬川源官银行。1915年四川 濬川源官银行发行的1元券，正面面值“壹圆”文字两侧各有1枚袁世凯像银币图案，左为背面图案，上有面值及两束嘉禾图案；右为正面图案，上为袁世凯侧面半身像，及“中华民国四年”字样。据考，袁世凯像银币只发行过民国三年、八年、九年和十年版，从未发行过民国四年版。目前市面所见民国四年版袁世凯像银币都是臆造品。此钞票面上的民国四年版袁世凯像银币，与正式流通使用的袁世凯像银币图案不同，并无真实货币存在，为仿币。



四川 濬川源官银行1元券

民国十四年（1925年）福建省莆田县涵江天益支票局发行的5角流通券，背面中央有1枚银元图案，上有面额“伍角”字样及两束嘉禾图案。经查，该钞票上的银币并非真实存在的银币，其图案乃模仿袁世凯像“中国”银辅币背面图案。因为袁世凯像银币有“中国”面值的辅币，但无面额“伍角”的辅币，并且袁世凯像“中国”辅币背面有“每二枚当一圆”文字，而该钞票上的银币图案上无此当值文字，故而判定该钞票上的银币并非真实货币，应为仿币。



福建莆田涵江天益支票局5角

民国十六年（1927年）福建省仙游县东区阜通汇兑局发行的大洋10角券，背面主题图案上方有10枚小银币图案，银币上无图案只有一个“拾”字，以并非实物货币的仿币图案标明钞票面值。



民国福建仙游县阜通汇兑局大洋票

民国十六年（1927年）山东省临驹县五井北朱家庄永盛堂庄号发行的1角流通券，背面中间有1枚银币图案，银币上有面额文字“壹角”及两束交叉的嘉禾图案。此银币为仿袁世凯像“壹角”银辅币背面图案，因为袁世凯像“壹角”辅币背面有“每十枚当一圆”文字，而该钞票银币图案上没有此当值文字，因而判定该钞票上的银币并非真实货币，应为仿币。

民国十九年（1930年）山东省青州城北李家官庄通顺德商号面值3角流通券，票正面中央印有关公人物像，背面中间为三枚相互叠压的银币图案，银币上有面值“叁



角”文字及两束嘉禾图案。据考，近代发行的银币品种虽然繁多，但从未出现过面值“叁角”的银币，因此该钞票上的银币并非真实货币，乃是仿币。



山东青州通顺德3角流通券

民国时期山东省临驹县东城土牛子恒吉堂庄号1角流通券，背面中间有1枚银币图案，是仿袁世凯像“壹角”银辅币背面图案，上有面额“壹角”字样及两束嘉禾图案，但无“每十枚当一圆”当值文字。



山东临驹恒吉堂1角流通券

前述民国时期山东省临驹县城西上石阜隆茂盛商号2角银洋券，民国二十年（1931年）山东省益都县城南井亭子昌盛号五角票，民国二十年（1931年）山东省乐陵县城内庆兴号国币1角流通券，票面上出现的银币图案，也都是模仿袁世凯像银辅币背面图案。

1949年国民党政府恢复银本位制，发行银元兑换券以取代早已崩溃的金圆券。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1949年中华版银元券，无论1元、5元、10元面额银元券，背面中央都有孙中山半身侧面像船洋银币背面“双帆船”图案出现。其中无地名银元券上的银币图案，银币上“双帆船”图案两侧有“壹圆”字样，为真实流通的孙中山像船洋银币背面图案；印有“广州”、“重庆”地名文字银元券上的银币图案，银币上“双帆船”图案两旁无“壹圆”文字，此银币并非真实流通的孙中山像船洋银币，为仿币。



重庆地名银元券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浙江省银行发行的银元兑换券1元，票正面右侧有1枚银币图案，上有孙中山半身侧面像，但无发行年份文字“中华民国二十X年”；票背面中央也有1枚银币图案，上有双帆船图像，但“双帆船”图案两旁无“壹圆”文字。正背面银元都不是真实流通的孙中山像船洋银币，皆是仿币。



浙江省银行银元兑换券

6.出现银币图案的近代钞票，其发行时间大多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之前，或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根据以上所展示出的钞票实物，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出现银币图案的近代钞票，其发行时间大多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之前，或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这与晚清民国时期银元发行流通的历史以及民国政府的几次币制改革密切相关。

自晚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东省铸造机制“光绪元宝”龙洋银元发行成功后，各省纷纷仿效，竞相铸造发行机制龙洋银元，机制银元逐渐成为全国各地主要的流通货币。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了《币制纲要》，规定以银元为货币单位，铸行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银币。1914年2月北洋政府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其主要内容是规定钱币的铸造发行权归民国政府所有，实行银本位，规定国币种类有银币4种（壹圆、中圆、贰角、壹角）、镍币一种（五分）、铜币五种（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正面镌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其中1元银元是国币主币，其重量7钱2分，材质是银占90%，铜占10%，以后就改为了银占89%，铜占11%。天津、南京、广东、武昌等造币厂陆续铸造袁世凯像银币。1933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中央造币厂从当月起开铸正面孙中山半身头像、背面为帆船图案的新银币。随着晚清各省龙洋银币、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银币、袁世凯像银币、孙中山像船洋银币的大量铸造发行，银币正式成为流通



中占主要地位的本位货币，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都使用银币。与此相适应，晚清民国时期发行流通的钞票上也大量出现银元图案。



孙中山像船洋银币

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英国、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1933年美国公布实施“白银法案”，提高银价，收购白银，禁止白银出口，导致国际银价骤升。世界银价的上涨，引发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影响了中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稳定。通货不足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银根紧缩，经济萧条，企业资金周转失灵，导致大量工商企业、银行、钱庄倒闭，史称“白银风潮”。为挽救危局，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财政部改革币制令》，宣布实施法币政策，废除银本位制，禁止银元流通，实行白银国有，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1936年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取消已获准发行纸钞银行发行的纸钞，即规定“法币”为惟一的法定货币。

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3日公布的《法币条例》第四条规定“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因此1935年11月以后发行的钞票上就不再以银元图案作为钞票主题图案。但有一个特例，中国银行1936年天津地名券、1936年无地名孙中山像券，背面都有1枚船洋银币背面双桅帆船图案出现。可知这两种钞票应该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制度改革前就已经设计印制好的，否则1935年底实行法币政策后，钞票设计应不会再采用银元图案作为装饰。

1949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失败，货币崩溃，7月南迁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公布《银圆及银圆兑换券发行办法》，规定自即日起恢复银本位制，国币以银元为单位，发行银元券以取代业已崩溃的金圆券，允许各种银币重新流通使用。因此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及各省银行发行的银元券上再次出现银币图案。

7.民国时期福建、山东省地方钞票上较多出现银币图案。民国时期福建各地民间钱庄、商号发行的民间钞票上较多采用银币图案作为

钞票主题图饰，设计精美，印制比较大，这成为了民国时期福建民间钞票的一大特色。如前所述，闽东地区的宁德县、福安县、古田县、霞浦县、寿宁县，福州地区的福清县、永泰县，闽中地区的仙游县、莆田县等地方钞票上大量采用银币图案作为钞票主题图案，其发行主体众多，既有钱庄、银号，也有商号、公司、汇兑局等。近代山东省部分地区地方钞票上也大量出现银币图案。近代福建省地方钞票上出现的银币，大多是以真实存在的流通银币作为钞票图案，而近代山东省地方钞票上出现的银币，则多为模仿真实流通银币的仿币。

8.因晚清民国时期国内印刷水平不高，大多数印刷厂家不能直接以照片为图制版印制，当时钞票上的银元图案大都需手工绘制，所以一些钞票上的银元图案与真实流通银元有些许差异。这也可以成为辨别钞票真伪的重要依据。

如清光绪己巳年（光绪五年，1879年）安徽省桐城县同兴福号钱庄发行的本洋1元券，票背面中央有2枚银元图案，银元为西班牙1808年发行的本洋双柱银元正背面图案。该银元图案即是描摹在我国流通使用的西班牙本洋银元，采用手工绘制的。

民国时期江西省万载县大桥泉源纸号发行的银洋1元券，票正面

中央为面值“银洋壹圆”字样，左右两侧分别印有1枚袁大头银元图案。左边为袁大头银币背面图案，上有面额“壹圆”二字及两束嘉禾图案；右边为袁大头银币正面图案，上有袁世凯半身侧面像及发行年份“中华民国三年”文字。此钞票上的袁大头银元正背面图案皆为手工绘制，与真实流通的袁大头1元银币正背面图文都有些许不同。



民国河北藁城三益花店1角流通券

民国年间河北藁城县角中村三益花店发行的1角流通券，票正面中央为面值“壹角”二字，左右两侧也印有1枚袁大头银元正背面图案。左边为袁大头1角银币背面图案，上有面额“壹角”、当值文字“每拾角换壹圆”及两束嘉禾图案，其图案与真实流通的袁大头银元1角辅币背面图案有些不同，流通袁大头银元1角辅币背面当值文字为“每十枚当一圆”，而非“每拾角换壹圆”；右边为袁大头银币正面图案，上有袁世凯半身侧面像图案及发行年份“中华民国 年”文字，其与真实流通的袁大头银元

1角辅币正面袁世凯半身侧面像、发行年份等图文也有差异。此票前几年集中出现过一批，但也有藏家认为是臆造票。

有一种民国十三年（1924年）同益官钱局银洋壹圆钞票，据说发行于陕西潼关地区。票面上发行机构名“同益官钱局”两侧印有“同官”二字，有人考证认为“同官”即今陕西省铜川市。笔者以为，“同官”二字也可能是同益官钱局的简称。票面正中印有1枚银币图案，为袁大头银币背面图案，上有面额“壹圆”二字及两束嘉禾图案，其中面额“壹圆”二字为黑色字体，两束嘉禾图案为绿色印刷，皆为手工刻绘书写。

民国年间福建省古田县东门巷陆宜和商号发行有2角大洋票，票正面横式设计，背面竖式设计，主题图案下方有两枚银币图案，银币上有面值“壹角”、“每十枚当一圆”字样及交叉双旗图案，其与民国十六年福建省铸造流通的总理纪念币壹角银辅币背面图案有些许差异。还见到一种福建古田陆宜和2角大洋票，票正面两侧加盖“福州”地名文字，印制较为粗糙，目前收藏界大多认为其是假票，也有认为是后加盖票的。

近代钞票上银元图案的印制工艺也可以成为辨别钞票真伪的重要依据。见有一种光绪三十二年天津

西门内牛市口德胜源银号发行的5元银元票，竖式设计印制，票背面中下方有2枚银币图案，分别为北洋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元正背面图案。但此钞票印制过于精美，连银币背面的原光色泽都印制出来了，显然在晚清时期我国的印刷技术根本不可能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因此可以认定其为臆造品。



注：本文附图来自网络，特此
向作者及收藏者致谢！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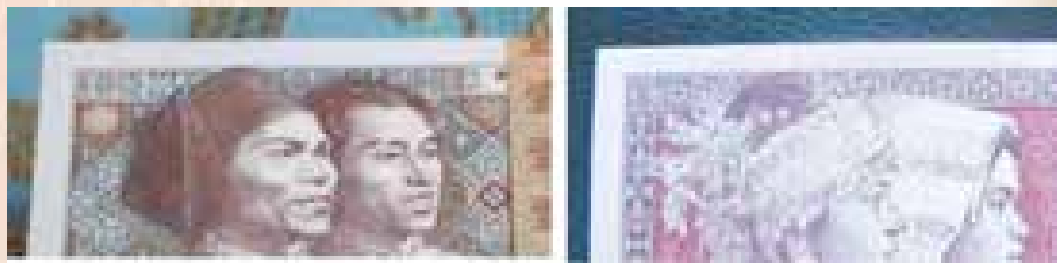
王铁藩：《辛亥革命福建铸币轶闻》，《福建钱币通讯》第6期，福建省钱币学会1991年7月出版。

大川稻滔：《福建省造币厂及所造银元》，芝麻开门收藏艺术网，网址 <http://www.kaimen360.com/article-3156-1.html>

作者：中国钱币学会会员、福建省钱币学会理事

浅析第四套人民币价值

■ 黄文晖 罗 敏 黄 竹



前言

2018年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公告，经国务院批准，2018年5月1日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在市场上流通。其实，虽说只是部分券别，但基本上第四套人民币的主要券别都退出流通领域了，仅剩1角、5角纸币可以继续流通和正常使用。

这些年，关于第四套退市传闻不断。今天，这只靴子终于落地，让人既兴奋又惆怅。兴奋的是退出市场后，第四套品相好的可以明正言顺地进入收藏市场，广大钱币收藏爱好者可以自由交易了；惆怅的是这套独具风格的人民币退出流通，还真有些叫人不舍。第四套人民币经历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助推了社会经济发展，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方便

流通使用和交易核算，可以说为人民大众创造幸福生活功不可没。第四套人民币在共和国的货币发行流通史上，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将越显弥足珍贵。

一、第四套人民币发行的背景

第四套人民币自1987年4月27日至1997年4月1日止，前后历时约十年时间，共发行了九种面额，即主币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辅币1角、2角、5角；十四种版别。其中1角券、2角券、5角券各一种版别，1元券三种版别（1980年版、1990年版、1996年版），2元券两个版别（1980年版、1990年版），5元、10元券各一种版别，50元券、100元券各两种版别（1980年版、1990年版）。其中，1990年版的50元、100元券增加

了防伪金属线。第四套人民币出齐共计十四种版别，上市流通时间三十余年。

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开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196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设计第四套人民币的设想，起因是湖北机械学院部分群众，对当时流通中的第三套人民币10元券（就是俗称“大团结”的10元券）背面主景中天安门上没有毛主席像、红旗和标语等提出尖锐批评，人民银行把这情况反映给国务院的同时提出了新版人民币的设计设想。1967年2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应准备一套新版人民币，设计图景要多反映生产关系方面的题材，克服第三套人民币生产力题材多的问题”。就此，断断续续经历三次报批均未成稿，终因受制于时代的主题思想变换多端浅搁；直至“文革”结束，摆脱浓重的政治色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终形成以“民族团结成票面主题”于1985年定稿后付印。从设计到付印，历时18年，个中艰辛，只有亲历者知晓。

二、第四套人民币的艺术价值

第四套人民币是共和国货币发行史上也是已流通过的五套人民币中颇具艺术价值的一套币。怎么看，都赏心悦目。整个四套票面的主题体现了“民族团结是我们国家永恒的主题”的设计思想。这一主

题理念也是全中国人民最容易接受的。中华民族有56个之多，世代生活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民族团结和谐是最重要的。所以四套人民币正面图景表现了各族人民大团结，用100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头像为主题，背面主景的主题却是自然风光，展现江山如此多娇。票面图景如下：

1角券正面为高山族、满族人物头像；2角券正面为布依族、朝鲜族人物头像；5角券正面为苗族、壮族人物头像。角券背面采用大幅图案。1元券正面为侗族、瑶族人物头像，燕子、桃花图案，背面为长城；2元券正面为维吾尔族、彝族人物头像，绶带鸟、翠竹图案，背面为南海的南天一柱；5元券正面为藏族、回族人物头像，仙鹤、青松图案，背面为长江三峡；10元券正面为汉族、蒙古族人物头像，凤凰、牡丹图案，背面为珠穆朗玛峰；50元券正面为“工人、农民、科学家”三人头像，背面为黄河壶口瀑布；100元券正面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领袖像，背面为井冈山全景。四套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人物头像上。艺术家通过对各民族、各类人物的风俗、习性、特征、气质的深入系统研究，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地创作了第四套人民币上的汉、蒙、藏、回、维吾尔、彝、

苗、壮族等人物形象，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准确、性格鲜明、气韵生动、惟妙惟肖。可以说，四套人民币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设计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在生活中使用是比较舒服惬意的。四套中，有两点是艺术和政治寓意结合得较好的典范。一是50元券“工人、农民、科学家”，科学家即知识分子登上了票面，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农的一部分，抒写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表述。为什么不用“工农兵”呢？当时的语境定义，“兵”是工农的子弟，不是一个阶级，所以50元券的正面主景就没有用“兵”。这个主景的写意是大众认同和接受的；二是百元大钞的主景画面堪称政治和艺术的完美结合。四套100元券的主景颇费心力。先前，毛泽东主席说过：活人不要上钞票，他本人就多次拒绝把自己的头像印在钞票上。但当时已事过境迁，且毛刘周朱都不在了。但四个领袖的政治影响力还在，人民缅怀他们。1984年国庆的游行时，人们就扛着四位领袖的大幅像。受此启发，艺术设计大师周令钊说把四位领袖像用上去。设计师们讨论，大家认为这种表现形式可以。从艺术的角度处理，确定用浮雕像。因为浮雕是纪念像不是人像，用上去表示纪念是最好的。

怀念。



至于排位，则参照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领导层文革前有一个流行的称谓：毛刘周朱陈林邓。但钞票上的排位却变化了，是毛周刘朱。周排在刘的前面。这个变化的考量，一是基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遵从了民意。这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不久前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上说的，周恩来是一个温暖的名字。他生前为国家民族复兴和人民群众的福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心中装着人民，人民也没忘记他。他是中华民族千年才出现的伟人。比肩汉之张良、三国时代的诸葛孔明。他上百元大钞且排序靠前是众望所归。整观第四套人民币，各券别雕刻凹版印刷的人物头像，线条清晰、刀法流畅，很好地体现了人物的精神风貌。每一幅头像都是一件很精美的艺术品，张张都闪烁着艺术的光辉。而所有票面的纹饰也富有民族特点，正面衬托面额的凤凰牡丹、仙鹤松树、绶带鸟翠竹燕子桃花的纹饰，都是我国人民

1988年，央行开始发行80年2角，到2002年截止，总共发行了约242个冠号。央行于2004年公开宣布对80年2角只收不付。因此，从那时起价格就开始上扬。小面额人民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年，因流通市场变化，小面额纸币因购买力下降，已逐渐退出市场。我们注意到前几年2角人民币还在流通，但是目前市场上流通的2角币种却越来越少大多地方甚至绝迹。第四套人民币2角券是最早停用的纸币，因价格低、投资者众，属绝版币。当第四套人民币1980年2角券正式退出流通之后，必定成为众多纸币收藏者所争相选择的币种之一。

第四套人民币版块中的奇葩——连体钞

在中国，人民币连体钞始发于1999年，这套首发的连体钞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4套人民币（180年版）的7种券别组成。由4体连、8连体及整版全张组成。这套连体

钞中，同一连张票后的4位号码相同。各种连体钞限量发行。

其中，4连体的发行量为10万册，8连体的发行量也为10万册，全张连体钞的发行量为1万册。它们的发行与人民币发行一样，需要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授权。在中国只有康银阁钱币有限公司和长城硬币投资有限公司是合法的发行连体钞单位。目前，市场上第四套人民币中可以收藏的连体钞主流品种有：以第4套人民币100元券、50元券、10元券为载体的4连体。连体钞作为一种装帧后的收藏品、艺术品，它的价值要高于流通使用的等额人民币。它的发行价格和市场价

去变现，以实现它的艺术品、收藏品价值。连体钞作为艺术品投资和收藏中的一个较新的品种，最近几年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发展，与之鲜明的特点是分不开的。连体钞的表面特点，可以用新、奇、特来形容。新——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板块能够将多张人民币连在一起发行，开创了钱币藏品类标新立异的先河。奇——4连体、8连体甚至35连体，连在一起发行又将钱币美感发挥到了极致。习惯了单张纸币的人们在感到视觉疲劳与收藏“免疫”的时候，连体钞的出现恰好迎合了人们好奇的“胃口”。特别，连体钞的特点之处不仅囊括了前面的新与奇，更是融入限量的概念。到目前止，任何连体品种都没有发现假币。并且，连体钞的证书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防伪功能。发行量小也是连体钞的优势之一。连体钞发行量最大品种为100万套，最小1万套。大多数在5万至20万套之间。关注那些目前市场价格较为合理的并且有较明显特色的品种，以期用较低的价格基数，获取较大的投资收益。从中长线角度分析，连体钞可以持续性地给收藏投资者带来投资收藏，毕竟连体钞作为一个面世时间不算太长、品种不多的比较有特色的收藏品种，随着其收藏投资的优势不断被市场发现，其自身也将不断地长线走牛。几年前，人民币

整版连体钞成嫁妆的故事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2017年，京东的整版人民币拍卖普通号在宣布退出流通前以30万成交，当四套停用公告公布后，出让者捶胸顿足。不过，像整版连体钞这种绝品恐怕市场上难以寻觅芳踪。这些量少甚至罕见的绝品早已为那些具有前瞻性的藏家收入囊中。有故事的人民币，总是格外昂贵一些。连体钞是一个“朝阳”板块，且没有国家政策的干预，未来前途不可限量，投资预期回报丰厚。

四、是记忆，也成永恒

第四套人民币在设计思想、风格和印制工艺上都有一定的创新和突破。主景图案集中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团结一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思想。在设计风格上，这套人民币保持和发扬了中国民族艺术传统特点，主币背面图景取材于中国名胜古迹、名山大川，背面纹饰全部采用富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图案。在印制工艺上，主景全部采用了大幅人物头像水印，雕刻工艺复杂；钞票纸分别采用了满版水印和固定人像水印，它不仅表现了线条图景，而且表现出明暗层次，工艺技术很高，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印钞工艺技术和钞票防伪能力。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第四套



人民币离我们渐行渐远，又怎么没有千回百转后的感念。毕竟，它陪伴了我们整整三十余年。对它，是记忆，也成永恒。就让我们铭记一段历史，典藏一份回忆。可以说，第四套人民币的使命已经完成。剩下的事，交给钱币收藏市场。

随着第四套人民币的退出，多元化的市场趋势也要求藏家及爱好者以更广阔的视角来寻找第四套人民币的价值洼地。近些年，中国纸币作为一个独具魅力的文化载体，在钱币收藏领域中异军突起，吸引了广大收藏者的关注。中国纸币收藏是一种品位高雅和收藏投资的体现，相对其它收藏，纸币收藏的门

槛高些。通过对钱币的收藏、鉴赏和研究，可以丰富人们的知识，提高审美水平，达到增添乐趣，陶冶情操的功效。同时，也是保值增值的明智选择。只要保持长线投资的良好心态，收益是肯定的。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退市停用的第四套人民币在未来的钱币市场中应当有相当不俗的表现。我们拭目以待。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名片人民币（马德伦主编）

钱生钱——人民币投资与收藏（黄竹著）

作者：工商银行贵州省分行干部

征稿启事

ZHENGGAO

《贵州钱币》学术研究和钱币知识普及并重，雅俗共赏，既需要有深度的专论，也需要有可读性的短文，要求来稿图文并茂，其中专论5000字以内，数字图片600万象数以上。

《贵州钱币》开辟栏目有《钱币专论》、《收藏鉴赏》、《钱币文化》、《防伪反假》、《泉海杂谈》、《往事漫忆》、《货币史研究》、《钱币真伪》、《投资分析》、《泉界动态》、《钱币之窗》、《币史钩沉》、《我与钱币》等。欢迎投稿，稿费从优。

来稿请寄地址：贵阳市富源中路318号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2楼 贵州省钱币学会秘书处收（请勿一稿两投）

邮编：550002 电话：0851-83921722

Email: 3240856288@qq.com

《贵州钱币》编辑部

光绪宝库局小平铸币新猜想

■ 黄雅迪

本文拟结合钱币实物和前人研究成果对光绪宝库小平铸币进行合理新猜想，也希望未来有更确切的史料和相关文物被披露和发现，能够最终确证光绪宝库小平的铸地和相关铸币细节。

（一）历史背景

在时代大背景下，光绪时期钱贵银贱，光绪三年开始鹰洋从每元可易制钱1019文，到不到千文^①，继而“渐减至九百数十文，甚有减至八百数十文者”^②。因此铜价上涨，铸制钱亏本，官方各钱局多不愿意铸币。光绪十二年，侍讲学士龙湛霖奏请“规复制钱”，建议将制钱重量减为1钱。慈禧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工部堂官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譞一并与议，提出以三年为期徐图规复的方案，经慈禧批准。但半年后又上奏说，“机器铸造工本过巨，京局开炉恐滋市井疑虑”。慈禧览奏大为震怒，下旨将户部堂官全都“交部严加议处”，还要求规复制钱“限于一年内一体办理就绪，毋再迟延干咎”^③。由

于清廷严令，钱荒严重，同时光绪十三年光绪皇帝亲政，新政新气象，因此各个铸钱局开始逐步铸造制钱，包括新设置的光绪宝津局也于光绪十三年开始铸币^④，但数量上和清朝康雍乾鼎盛时相比已经大为减少，如光绪宝晋局在光绪二十五年才开1炉，第二年又加1炉，仅仅开两炉铸币；光绪宝南局光绪二十二年才又开铸重8分8厘的减重制钱，至二十五年因铜铅价格太高产量日少而停铸，光绪宝直局铸币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告裁撤。光绪宝库铸币也应该是在光绪十三年以后才开始铸造。在钱贵银贱的背景下，足重甚至超重的大样币只会是少量铸造，而减重币才是符合实际的合理选择，因此光绪通宝大样铸币目前存世不多，而中后期减重币较多。

（二）实物研究

近年光绪宝库局小平铸币随着互联网络钱币交易的兴起在交易区频频出现，观其实物铸币风格和文字穿口等，均为真币无疑，笔者也收入一枚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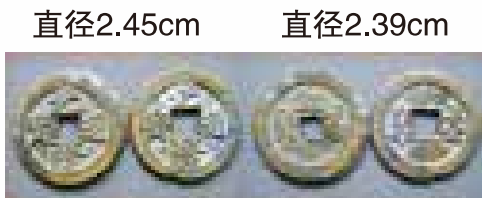


笔者自藏

此类币铜质均为黄铜质，部分铸币表面泛红，其内部仍为黄铜，观其形制布局合理，文字合规，必为官炉铸造；钱币包浆有未流通黄亮包浆和流通传世黑漆古包浆两种；文字写法有标准版（满文库头写法仰）、大字版（满文库头写法较圆）、小字版（满文库头写法略仰）、标准版满文俯四种写法，还有一类满文左右反写且“通”字写法为方头通的铸币；直径大中小样均有（直径2.45cm—1.9cm均有），加工从精细到粗劣均均有。对比同时期铸币实物，绝非样币混入普通铸币流通，也绝非民间私铸币（由于有部分直径1.9cm加工较粗劣光绪宝库铸币存世，不排除局私的可能）。此类币铸币应持续铸造一定时间，非突发集中铸造，否则不会有大中小样铸币存世，并且此类币迥异于光绪时期民间私铸币，应为正规官方钱局铸造。



古泉园地，光绪通宝私铸币



直径2.45cm 直径2.39cm

古泉园地，标准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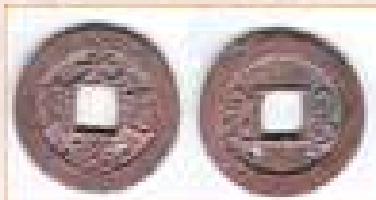
古泉园地，大字版



古泉园地，小字版，直径2.15cm



古泉园地，直径2.45cm，满文库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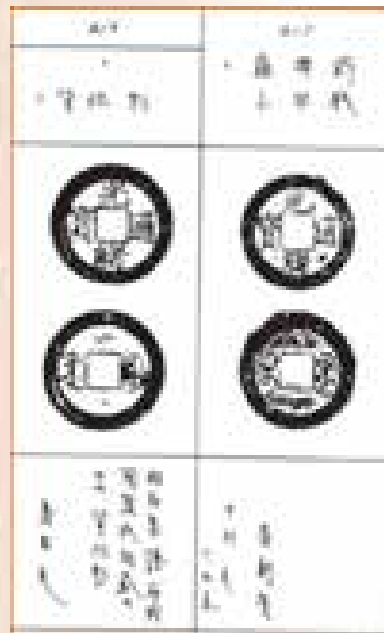


古泉园地，满文反写

（三）前人研究成果

此类铸币一定数量的实物出现，也引起了钱币收藏家及爱好者的注意。在日本编著《清朝钱谱》第240页有光绪宝库小字版和满文

反写版的拓片记载，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枚钱币是编排在新疆铸币类中的，同时特别备注了小字版为“黄铜质”^⑤，满文反写版原图在《昭和泉谱》上。



《清朝钱谱》光绪宝库图

国内部分，在朱卓鹏、朱圣弢所著《新疆红钱》中所录钱拓中“光绪红钱图录”部分出现了光绪宝库小平铸币的纪录^⑥，《新疆钱币》1999年第2期蔡龙根先生在“漫议红钱的早期伪品”一文中提到了“光绪通宝”背满文“宝库”钱，认为其为民国钱商臆造伪品，意在满足钱币收藏者猎奇的心理^⑦，《新疆钱币》2006年第2期邹志谅先生结合该币发现地域大多在京津地区和相关文献考证认为该类币为真币，但是该类币应分两类，

一类为大样的光绪宝库部颁样钱混入普通铸币进入流通，一类为直径特小的光绪宝库铸币为局私或私铸钱类^⑧。

（四）文献背景考证及对比研究

我们回顾清代新疆库车局的历史。宝库局的设立有道光六年、咸丰三年和六年三种说法，此处不做讨论。同治四年（1865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因回民起义和阿古柏入侵，库车局停止铸币。光绪四年（1878年）库车局恢复，帮办新疆军务张曜委派龙魁、潘时策负责筹办重开，三月十八日按左宗棠交给的乾隆通宝样钱，开始铸币，每红钱重一钱二分，“钱之阴面均以半边月圈为记”，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库车同知李时熙、铸局委员邹子鸿开小火炉一座，每文重一钱三分，其中四成铸“乾隆通宝”，其他照常，钱背上标记库字，表示为库车局所铸造，背下仍标记十字，“以顺舆情”。光绪十二年（1886年）冬库车局撤，光绪十八年（1892年）阿克苏铸钱局移设库车铸币，光绪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铸“光绪丁未”和“光绪戊申”纪年铸币，宣统时代铸乌什局“库十”钱^⑨。

首先，由历史记载和新疆发现库车局钱币实物可知，其一直所铸造的都是新疆“红钱”，从未有铸造黄铜币的历史记载，同时新疆本

地大量红钱实物中也未发现光绪小平宝库铸币实物，因此光绪小平宝库铸币不是新疆库车局所铸造。新疆不产白铅（锌），由于路途遥远，内地转运白铅费工费时，因此当时新疆铸币材料只有本地所产黑铅（铅）、铜和“西安遇便搭配”的点锡（锡）（占总材质的1%）。由于铜含量占铸币含量70%左右，所以新疆所铸钱币呈现的颜色为红色，而不是内地其他钱局铸币成品所呈现的黄色（黄铜需锌含量到40%左右）。据董庆煊著《新疆近二百年钱币图说》中“关于红铜钱，黄铜钱问题”的记载，在新疆红钱中发现了极少量的黄铜铸币，推测应为黄铜佛像等器具溶化铸钱后造成，非新疆铸币局特意仿照内地铸钱局配比金属合金造成^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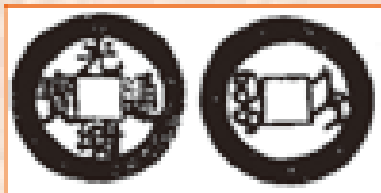


古泉园地，光绪新疆库车局铸币实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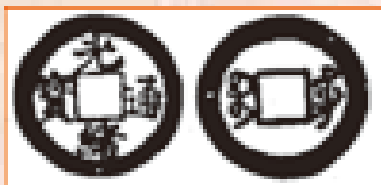
其次，从铸币风格看，我们直观上对比图9新疆库车局红钱铸币实物与图2-7光绪宝库铸币实物，从材质、文字风格、加工工艺、直径重量等方面对比，可以说无一处相似，完全是两种风格。光绪宝库铸币完全没有新疆风格的影子，反

而与同时期的光绪宝津、宝直、宝沽、宝晋、宝东等大样铸币非常近似。因此光绪小平宝库铸币不是新疆库车局所铸造而是内地铸币局所铸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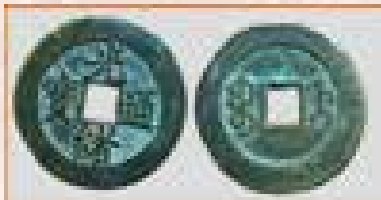
对比公认的光绪朝部颁样钱和母钱等制式实物和图片，我们发现光绪朝官方所指定的部颁文字体系中，其中一套为标准部颁体系（主要参考《故宫清钱谱》^⑪），另外一套为云川南武等南方部颁体系（文字变异而具有地方特色）。



《故宫清钱谱》宝直局样钱



宝东局样钱



古泉园地，宝直局铸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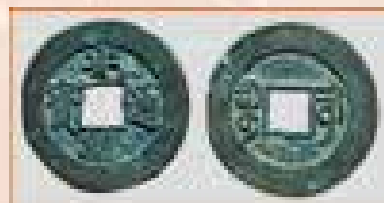
古泉园地，宝东局铸币



古泉园地，光绪宝津早期大样



古泉园地，光绪宝晋早期大样



古泉园地，光绪宝沽早期大样

对比文献记载和实物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光绪宝库铸币正是属于这一套标准部颁样钱铸币风格体系，很可能宝库铸币就是内地铸币局所铸造。实物发现也支持了这一观点，近年发现光绪宝库铸币的地方也多在北方，至今光绪宝库铸币未见南方典型蓝绿锈者。

同时，我们研究光绪宝库铸币实物可以发现，很多实物有移范、铸口加工不精、穿口毛刺、满文不清晰、钱币地张不光滑等现象，对比光绪宝津局、光绪宝直局及宝沽局大样铸币实物和中后期铸币实物，宝津局、宝沽局和宝直局钱面光洁度比它局光绪制钱要好很多，少泉泉友甚至在“试论宝津局制钱及其代铸它局制钱之渊源”中提出

了宝津局改范铸钱而不用雕母翻砂工艺的新猜想，光绪宝库部分铸币加工工艺相比要略逊一筹。光绪宝津局和光绪宝直局中后期铸币文字图案等相对于于初铸大样有较大变化，尤其光绪宝津局中后期符号铸币面文演变为黄山谷体楷书^⑫，因此光绪宝库铸币也不大可能为宝津局和宝直局中后期铸币。



古泉园地，光绪宝津早期大样批量图



古泉园地，光绪宝直早期大样批量图



古泉园地，光绪宝东铸币批量图

最后，清代代铸现象较多，因此光绪宝库被其他钱局代铸是可能的。如2011年第一期《江苏钱币》《漫谈康熙满汉文“河”字双点通钱的版式——兼谈它局代铸问题》（喻战勇）一文根据康熙满汉文“河”货币实物有多种面背钱局错

配的现象，提出康熙时各钱局代铸的猜想^⑬。清代新疆红钱钱局由于路途遥远等原因时有代铸钱币现象发生^⑭，清代宝台铸币实物研究也支持了宝云局代铸宝台局的观点^⑮，清代乾隆宝福局代铸的乾隆宝台也有史料和实物支持，清代乾隆初曾见于文献记载的云南省代京铸钱尝试^⑯等。文献记载，清代还有制钱协运制度。

综合上述研究，笔者认为光绪宝库铸币毫无疑问为官方铸币，从文字和铸币工艺等方面更类似光绪宝东铸币，同时其实物发现地域也集中于北方，因此笔者合理推测光绪宝库铸币为光绪十三年后为彰显光绪亲政由北方钱局所铸造，尤其可能为宝东局所铸造，其大样到小样的演变版式和宝东局铸币演变过程类似，其铸造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一定数量实物存世。但是，光绪宝东局史料记载不多，不同于云南宝东局和山东临清宝东局。相关资料记载“光绪十三年五月，山东在烟台设炉铸钱，每文重1钱，沿宝东局旧名，拟一年内先铸10万串交户部。”光绪山东巡抚张曜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372-056记录，公元1887年年东海关铸钱重量为1钱，查东海关条目，“清代税关之一，同治二年设，在今山东省烟台市芝罘

半岛。”综合以上两条，宝东局铸币即为东海关在光绪十三年五月开始所铸币。其铸币数量和可能代铸原因等由于资料缺乏不明，因此只能等待更多史料的发掘整理及后续研究的跟进。

参考资料：

- ①《钱市窒碍》，见《申报》光绪丁丑(三年)十月十一日。
- ②《请畅行大小银圆议》，见《申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 ③《光绪年间的钱贵银贱与江南制造局铸钱》，叶世昌，《中国钱币》2006年第4期
- ④《谈宝津局光绪通宝》，吴进 王荣成，《安徽钱币》2008年第4期
- ⑤《清朝钱谱》(拓本·解说集),搞史朗监修
- ⑥《新疆红钱》，朱卓鹏 朱圣弢著，学林出版社，1991年5月
- ⑦《漫议红钱的早期伪品》，蔡龙根，《新疆钱币》1999年第2期
- ⑧《未发出的部颁宝库“光绪通宝”样钱》，邹志谅，《新疆钱币》2006年第2期
- ⑨《清代库车局及其铸钱研究——清代新疆铸钱局研究之三》，王永生，《中国钱币》2010

年第3期

⑩《新疆近二百年钱币图说》，董庆煊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⑪《故宫清钱谱》，黄鹏霄著，文海出版社，1984年

⑫《宝津局光绪通宝面文黄山谷体探源》，张少华，《安徽钱币》2011年第3期

⑬《漫谈康熙满汉文“河”字双点通钱的版式——兼谈它局代铸问题》喻战勇，《江苏钱币》2011年第1期

⑭《浅谈清代新疆红钱钱局代铸钱币现象》，唐养文，《新疆钱币》，2008年第4期

⑮《清代宝台局铸造钱币始末——兼谈咸丰小平宝台铜钱铸地猜想》，黄雅迪，2011年“海峡两岸钱币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⑯《乾隆初滇省代京铸钱失败原因浅析》，王德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3期

作者：中国钱币学会会员 贵州省钱币学会常务理事

从人民币发行看新中国的繁荣昌盛

宋康年

有人说，货币，是一个国家的名片，一个国家的代言人，一个国家的形象大使，这些比喻都很有道理，而且也很贴切。恩格斯曾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哲学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由于货币是经济的核心，所以说货币发行就是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标志，它生动地显示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与综合实力，中国的人民币的发行在世界人们心目之中就享有这样一种信誉与是崇高的魅力。

“江山万代春常在，祖国繁花盛开。”用它形容新人民币的发展史，可说是最恰当不过的。回忆从1948年12月1日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到1999年10月1日第五套人民币发行的历程，是从一起个繁荣昌盛走向又一个繁荣昌盛的历程，同时不难看出它们各自以独特的风格反映历史。也证实了自身的价值，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是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战争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在解放战争的炮火连天中诞生的、它具有战时货币的性质。1948年12月1日，当时在华北银行，

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组建起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的，计有12种券别，62种版别，从而揭开了中国金融事业崭新的一页。当时人民币的券面设计有“矿车与骡子”，“机耕”，“牧马”，“牧羊”，“新华门”，“收割机”等图案，另外还多次出现有“工人”，“人民”等用语，如200元券正面上有“排云殿”。“解放全中国”，背面有“和平条件”；10元券正面有“自立更生”等字样。这些图案和文字除在发挥防伪作用的同时，它清除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货币，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几十年通货膨胀和中国近百年外币在市场流通买卖的历史，促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建国初期经济恢复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它生动地记录了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成为中国革命史的实物见证。但由于第一套人民币的文字说明单一。面额较大，单位价值低，不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因此第一套人民币于1955年5月10日停止了流通。

第二套人民币，是在巩固计划经济体制下发行的。1953年设计，1953年3月1日发行，它的设计主题思想明确，分票以工业，交通为主题，角票以反映农业机械化，搞好

生产，建设工业的场面，面值有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十元及辅币，券面分别有“飞机”，“汽车”“轮船”“火车”“拖拉机”“水电站”“天安门”，“井冈山”，“宝塔山”“民族大团结”以及工农像的图案，象征着我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以及人民当家做主参政议政的风貌，同时又体现了新中国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风貌。在印制工艺上除分币外，全部采用胶凹套印，具有较高的防伪反假功能。

第三套人民币，于1959年设计，1962年4月21日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关于发行棕色五元券和红色壹角的通告》标志着第三套人民币发行的开始。券面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武汉长江大桥”，“纺织厂生产”，“炼钢工人”等图案，集中反映了当时我国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并举的方针，表达了新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精神风貌。特别应指出的是这套人民币是我国首次完全独立设计，印制并流通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套，它始发于我国三年经济特困时期，然后经历了“暴风骤雨”式的文革动时代，后来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历经了40年风风雨雨，留下了各个时期社会政治与经济情况和时代烙印。

第四套人民币，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吸取历史营养，进入了真正的辉煌时代，1987年4月25日由国

务院发布《关于发行新版人民币的命令》责成中国人民银行于1987年4月27日起陆续发行，这套人民币在设计思想，风格和印制工艺上都有着一定的创新和突破，主题思想鲜明突出，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券面的纹饰采用仙鹤，松树等富有我国民族特点的图案，正面主景采用大幅人头像，雕刻工艺复杂，纸币分别采用了满版古钱水印和人物头像固定水印，大大加强了防伪功能。除此它最大的特点是强调了政治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合，悠久历史，民族文化的和谐统一。

第五套人民币，也就是跨世纪的人民币，它是在1999年10月1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这是我国货币制度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为国庆5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这套新版人民币，集中体现了社会对货币的需求，既有鲜明时代特色，又符合中国国情，达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完美统一，它首先具有技术上的先进性，继承了我国印刷技术的传统经验，又借鉴了国外钞票设计的技术，提高了纸张的综合质量和防伪性，固定水印立体感强，形象逼真。并且采用了电脑辅助设计，手工雕刻，电子雕刻和晒版腐蚀相结合的综合制版技术，特别是防伪技能由十几种增加到二十多种，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其次，在内涵的政治性，思想性上大为加强，这套新版人民币充分反映了我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社会各项事业取得进步，国际地位显著提高，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统一祖国大业正在有力地向前迈进。再次，在图案设计上，选用了有代表性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图案，体现出我们伟大祖国悠久历史和壮丽山河，弘扬了伟大的民族文化，如100元券下面主图案采用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的头像，底衬采用我国著名花卉图案，背面图案选用我国著名人文景观的人民大会堂，庄严，宏伟，象征着我们伟大祖国山河壮丽，人民幸福，江山永固。

总之，货币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它既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功能，又是反映民族文化和精神面貌的艺术品，说到底，它是国家综

合实力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状况的综合反映，发行新版人民币就是我国目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艺术繁荣，科技进步等有力证明。同时也再一次生动而有力地说明只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国家才会走向繁荣富强，人民才会过上自由，幸福，美满生活的这一根本道理。因此，我们要求全社会都要自觉地养成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爱护人民币，保护人民币，坚决严厉打击一切造假者，贩假者，切实保障人民币的正常流通。

作者：中国钱币学会员 安徽望江县博物馆

从一枚钱币，了解一段历史

■ 费勇

偶然在八十年代一工地捡得一枚铜钱，钱上有字为隆武通宝。局限于当时的条件，只知道“隆武”是朝代年号，而不知具体是哪朝哪代的，从所学历史课本上知道这枚古钱不是熟知的清朝钱币，也不是自己了解的唐、宋朝年号。

时过境迁，在以前的文具盒中又见此钱币，勾起了查找“隆武通宝”兴趣，这钱币究竟是何朝何代的。于是拿起手机百度了一下，由此从一枚古钱币上，我了解了一段

历史。

隆武通宝属于明朝南明铸币，清顺治二年，南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人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铸行“隆武通宝”。隆武二年八月，清军攻入闽，俘隆武帝，隆武帝绝食死于福州囚处。唐王政权灭亡。

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大顺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明思宗（崇祯皇帝）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今景山）自缢身亡，大明王朝的

历史划上了句号。然而，由于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十三布政”的行政区划体制，当时虽然北方的京都（北京）已经陷落，但南方的京都（南京）犹在，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了一些地方性政权，史称“南明”。南明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



贵阳怎么会出现“隆武通宝”呢？这就不得不说南明永历政权在贵州的一段历史了。原来唐王政权灭亡后，明朝两广总督丁魁楚等人共推桂王朱由榔监国，后在桂林称帝。在南明四个政权中，桂王政权是存在时间最久的一个，先后延续了十六年，桂王政权曾控制过云贵、两广、湘、川等广大地区，而且与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李定国、李锦等人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清。公元1649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大西军）余部数万人马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率领下在进入贵州，并占领了省城贵阳。此时，永历王朝在两广地区的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永历皇帝被清军追得东逃西窜，惶惶然不可终日。张献忠的义子孙可望当时驻扎在贵阳，张献忠生前曾叮嘱过他：“我

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根据张献忠的抗清遗愿，孙可望提出“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的口号，这就决定了孙可望必须打南明永历王朝这张“牌”，为自己的行动“正名”。孙可望即派总兵王爱秀前往广西“护驾”，并带去了他给永历皇帝的奏章，奏章说：“广南虽云内地，界邻交趾，尚恐夷情叵测。臣再思维，唯安隆为滇黔粤三省会区，行宫修葺，一切粮储可以朝发夕至，莫此为宜。”于是，穷途末路的永历皇帝朱由榔在孙可望的安排下，从广西赶往大西军控制的贵州安隆避难，偏安一方。名不见经传的小村镇安隆也摇身一变成了南明永历王朝的都城。安隆当时只是贵州的一个千户所城，居民不过百家，人口不过数千，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不过一个村的规模而已。永历皇帝到达安隆之后，虽然没有过上真正的天子生活，但总算是暂时告别了颠沛流离之苦，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小朝廷。为了显示皇帝的最后一点尊严，他下令将“安隆”改为“安龙”。永历皇帝朱由榔在安龙虽然位居九五之尊，但实际上过的是一种寄人篱下的苦难日子。没有稳定的统治区域，没有赋税收入和其他财政来源，整个小王朝的费用全赖孙可望的施舍度日。对于孙可望来说，永历小朝廷不过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而已。他名义上尊奉永历年号，而自己却自称秦国国王。

他在贵阳大兴土木，设立行营六部，俨然就是一个完备的朝廷，全然不将永历皇帝放在眼里。朱由榔虽然昏庸无能，但毕竟是天子之身，做皇帝做到这种份上，他也不甘心、不服气。于是，他和部分朝臣密议，决定利用大西军另外一个重要首领李定国（李定国也是张献忠的义子）与孙可望的矛盾，除掉专横跋扈的孙可望，重振朝纲。永历皇帝遂让大学士吴贞毓草拟诏书，并铸“屏翰亲臣”玉玺，派人到广西给李定国”密下敕，令统兵入卫。”李定国接旨后即统兵入黔



“护驾”。但是“护驾”队伍尚未到达，坐镇贵阳的孙可望已经得到密报，即派部将郑国到安龙质问永历皇帝，胁迫朱由榔说出事件主谋。面对下属部将，永历帝竟然吓得浑身发抖，只好含糊其辞地说：

“朝廷播迁，此事定是外人盗宝所为。”永历帝密召李定国入黔护驾事件，给孙可望提供了一个造反的口实，他其实早就想取朱由榔而代之。现在事情败露了，生性懦弱的永历帝不但不敢承担责任，反而在孙可望的威逼下，下诏将参与其事的大学士（宰相）吴贞毓、朝臣张镌、太监张福祿、全为国等十八人

尽行处死，让他们充当替罪羊。忠心耿耿保皇上，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吴贞毓等人是否知道，处死他们的命令就是他们的同谋与主子永历皇帝签发的呢？如果知道，他们一定死不瞑目。吴贞毓等十八人被杀后，后人在他们殉难的安龙城西天榜山下建造了“明十八先生墓”，以为永久的纪念。如今，“明十八先生墓”已列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安龙县的一处著名旅游景点。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主力从湖南、四川、广西三路进攻贵州，孙可望、李定国的大西军精锐损失殆尽，朱由榔狼狈西逃，于次年经云南进入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永历皇帝被俘。次年（1662年）元月，朱由榔与其子被吴三桂缢杀，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终于灰飞烟灭。永历王朝是明朝北京中央政权灭亡后残存时间最长的一个南明政权。它前后延续了16年之久，其中有4年的时间存在于贵州。这是贵州这片土地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一个封建王朝的朝廷与都城。贵州省（十三布政）是明朝永乐时期建立的，而大明王朝（包括南明）最终却在最后贵州落下帷幕。这段历史不禁让人感慨，贵州这片神奇而边远的土地，竟与大明王朝有着如此的渊源关系。

作者：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干部